

## 《從“廁所峰會”到“廁所革命”》

曾幾何時，誰會預料到這個“臭名遠揚”的廁所名字，會出現在堂堂的國際會議的議程上呢？看看近年來國際“廁所峰會”的流水帳，叫人耳目一新。

2001年底，來自芬蘭、英國、美國、中國、印度、日本、韓國、澳大利亞和馬來西亞等30多個國家的代表，在新加坡舉行了第一屆廁所峰會，一直難登大雅之堂的廁所問題，首次現身高級別議事廳，並為全世界輿論界所關注。自後這個世界《廁所峰會》(World Toilet Summit) 每年都會在不同地點舉行，其間，2004年的第4屆和2011年的第11屆，都是在北京召開的。

2013年第67屆聯大通過決議，把11月19日定為“世界廁所日”並且在決議中指出，全球現在仍有25億人缺乏廁所，11億人“隨地大小便”（原譯文的詞語）。

2014年世界廁所日的主題是“平等與尊嚴”。

2015年世界廁所日的主題“發掘公廁歷史，弘揚公廁文化”。

2016年世界廁所日的主題：“使用衛生廁所，享受幸福生活”。

2017年世界廁所日的主題：“廢水”。

從此，廁所成為環保的熱議題目，備受多國元首的關注。在中國更是破天荒，由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、國家主席、中央軍委主席，對2015 兩年多以來的“廁所革命”作出重要指示。這個久候的、不流血的革命，終於到來了。大家都祈望一洗這個民生積患。

猶記得五十年代，回國觀光的女士們，最頭疼的問題是上廁所。一直到 70年代，問題還沒解決。1971年，一位美國記者向周恩來提出廁所問題：“中國現在四億人，要修多少廁所呢？”這一問，幾

乎難倒了這位能言善辯的總理。他只好半開玩笑地回答：“兩個！一個男，一個女。”他總算勉強閃避了話題，然而，明眼人可以想像他回答時，內心的感慨與尷尬。說得明白點，是時，中國還沒有能力去兼顧這個日常難題。



周恩來回答美國記者時打着“兩”的手勢

從這個角度看，對廁所的處理，也可以衡量一個政府的預算是否寬裕。試舉香港的經驗為例。香港到上世紀中葉，當社會已到達了小康的生活水平時，才有能力着手去清理廁所問題。

羅能士（John Martin Rowlands, C.B.E. (1925-2004)，香港入境事務處處長（1974-1978），香港政府公務員事務局局長（1978-1985），是我在香港屈指可數的幾位英國朋友之一。<sup>1</sup> 有一天，他很認真對我說，香港現在有條件處理好廁所問題。那時候，香港的經濟情況正值進入

---

<sup>1</sup> 我認識羅能士是因為他太太 Christiane 跟我學中文。1966年 Christiane 回英國度假去，他晚上無事，常約我閒聊。他富有同情心，敢於仗義承擔。是他在70年代，“藉口”有颶風襲港，讓一艘越南船上的難民上岸。在這個敏感的難民（所謂 boat people）處理上，開了先例。為了這次的果斷的“先斬後奏”，他受到他祖家英廷的責備。

較富裕的小康階段，讓旅遊業務、市容整頓和市民的環保意識，實現全面的展開。

如果上面這個描述對的話，那麼中國提出“廁所革命”，也表示已開始或快要踏入小康階段了。

香港和大陸，對廁所一先一後的行動，都不愧是一次大家喜聞樂見的革命。